

农民的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

Income Gap between Peasants and Their Consuming Requirements

刘 淼 肖江华
(天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一、农村改革以来农户收入差距的变化

改革十年来,农村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农民的收入普遍提高。1978~1989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4.5倍,年均增长率达16.23%;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978年的116.06元增至1989年的535.37元,增长了4.6倍,年均增长率为16.52%。但是,由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不同,各地区、各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拉开了。根据对四省一市(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和天津市)部分农村地区的抽样调查,在1 525户样本中,1987年纯收入在万元以上的虽然只有24户,占总体的1.57%,但他们的收入数额却占总体的26.5%,最高收入户为22万元,贫富悬殊过大。这种情况在1988年治理整顿后有所转变,相对于平均值来说,离散程度逐年缩小(见表1)。这种离散程度的缩小主要是由于2 0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的比率相对减少造成的(见表2)。

表 1 1987~1989 年农民户均纯收入及差距变化

时 间	户均纯收入 (元)	标准差 (元)	离散系数
1987	2 696	1 888	0.70
1988	2 928	1 978	0.67
1989	3 186	2 034	0.64

对于这几年农民收入差距缩小,人们有一种印象,认为似乎是由于政府采取政策限制了高收入农户数增加造成的。在我们的统计分析范围内,正好显示相反的原因,即5 000元以上的高收入农户从1987年的8.4%上升到1989年的16.7%,翻了一番。而2 0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却从1987年的48.7%下降到1989年的31.4%。可见收

入差距缩小主要原因是低收入的农户减少了,这符合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原则,证明治理整顿的效果与目标是一致的。

表 2 1987~1989 年农民户均纯收入分布(%)

纯收入 (元)	1987		1988		1989	
	百分比	C% ↑	百分比	C% ↑	百分比	C% ↑
0.000-1000	27.4	27.4	23.0	23.0	16.1	16.1
1000-2000	21.3	48.7	19.7	42.7	15.3	31.4
2000-3000	20.1	68.8	19.4	62.1	22.4	53.8
3000-4000	12.6	81.4	14.6	76.7	16.6	70.4
4000-5000	8.6	90.0	10.0	86.7	10.3	80.7
5000-6000	3.7	93.7	5.6	92.3	8.1	88.8
6000-7000	1.8	95.5	2.9	95.2	3.7	92.5
7000-8000	1.6	97.1	1.5	96.7	2.7	95.2
8000-9000	0.6	97.7	0.9	97.6	1.1	96.3
9000-10000	0.7	98.4	0.7	98.3	1.1	97.4
合 计	98.4	98.4	98.3	98.3	97.4	97.4

注:根据四省一市农村抽样调查资料编制,删除万元以上户。

二、不同收入农户的消费需求

我们从调查资料的分析中发现,不同收入层的农户对消费的需求是不同的。消费需求按基本生活需求、生产性需求、享受性需求、发展性需求的顺序排列。收入变项是按1989年的纯收入分为三层,即2 000元以下为低收入层,2 000~5 000元为中收入层,5 000元以上为高收入层。具体分布见表3。

为了便于直观,我们借用坐标图表示表3的资

表3 1989年不同收入农户的消费需求(%)

纯收入	基本生活消费需要			生产性消费需要			享受消费需要		发展消费需要	
	1. 吃	2. 住	3. 穿	4. 生产投资	5. 农需物资	6. 科技	7. 家电	8. 家俱	9. 子女教育	10. 文化娱乐
高	3.0	10.4	0.8	14.4	15.2	16.6	7.2	7.2	16.4	9.0
中	3.0	12.7	0.8	13.1	20.5	16.6	7.4	7.1	13.4	5.4
低	5.7	11.8	2.6	13.0	23.1	17.9	6.4	5.2	10.1	4.3

料,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收入层的农户在消费需求上具有大致相同的趋势,即三高两低,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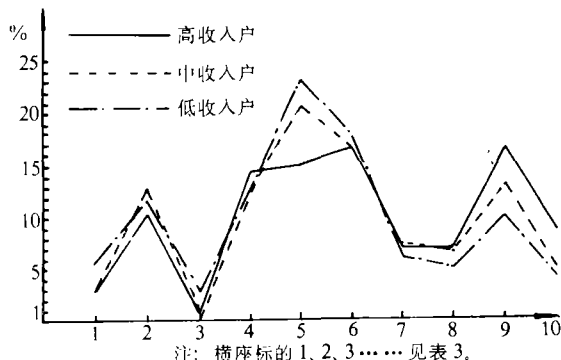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收入农户消费需求示意图

注：横座标的1、2、3……见表3

个坐标图呈“山”字型。各类农户的主要需求都落在生产性消费需求上,所以出现中间高峰;生活消费需求则集中在住房上,选择“穿衣”的户数极少,所以出现一高一低;享受性消费需求虽比“穿衣”更重要一些,但比发展性消费需求中的“子女教育”要低,所以出现末端的一高一低。很明显各类收入农户对各种需求项目的强烈程度是不同的。对“科技”和“子女教育”需求,高收入类农户最为强烈;而对“农需物资”需求,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农户更为迫切,高收入农户相对较低。

三、对不同收入农户消费需求的分析

1. 对共同消费趋势的分析。

前述“山”字型表示了不同收入层农户消费需求的共同趋势,不同收入农户消费需求的众数都落在生产性消费上面。这说明农民家庭既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既然是一个生产单位,当然要先安排生产,后安排生活。只要家庭功能不变,这种趋势就不会发生变化。

在生活性消费中,众数落在“住房”上,而吃和穿都相对较低。原因是吃饭问题在我们调查的地区已基本解决。“七五”初期国家规定的农村扶贫线为人均收入不足200元。若把物价上涨因素考

虑在内,1989年农村扶贫线约为350元。按照这个标准,调查样本中只有7.6%的农户在扶贫线以下,90%以上的农户吃饭问题已经解决。另据对1487户农民对吃饭水平的自我评价测量,回答吃得很差的只占1.7%,认为吃得一般和吃得好的分别占46.8%和51.5%。所以从总体上看,吃饭问题并不重要。众数落在住房上是由于吃饭问题解决以后,住房问题就成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穿衣”的频数下降却有特殊原因。吃饭和住房在家庭成员中具有“共享”性,所谓“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房”,家庭成员之间差别不太大。但是“穿衣”却不同,同一家庭的成员在衣服质地款式和拥有数量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调查中访问的对象大多是家长或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对“穿衣”需求的回答主要反映了他们个人态度。

“山”字型曲线右边的一个起伏,反映不同收入层的农户都把子女教育看得很重要,而且越是收入高的农户越是看得重要。这说明对子女的教育是和发生产,增加收入相联系考虑的。高档享受性消费和文娱消费,虽然呈上升趋势,但与教育相比,在总体上仍不占重要地位。

2. 对不同消费需求的分析。

在上述共同消费趋势中同时包含着不同收入层农户在消费需求上的差异。

首先,在生产性消费需求方面,高收入农户比中,低收入农户的需求程度低得多。虽然高收入农户对生产投资的需求比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各高出1.4和1.3个百分点,但高收入户对农需物资的需求比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分别低7.3和5.3个百分点。而且低收入户比高收入户对科技的需求也更强烈些。统计显示,纯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农户与收入较低的农户相比,对生产性消费需求呈下降趋势。这是为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农村十年改革来的发展历程,这对我们理解农民消费需求差异会有帮助。

我国农村改革历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79~1984年是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经营体制改革的阶段;从1985年开始进入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变传统的农业经济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第二阶段,即深化改革阶段。在第一阶段,农业发展很快,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4%,粮食总产增加了1亿吨,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以年均15.5%的速度增长。但是自1985年农村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以来,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业发展的势头减弱了,尤其是粮食出现了徘徊,棉花总产大幅度下降。第二阶段的前三年(1985~1987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的速度下降为4.22%,农村改革呈现时进时退的胶着状态。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扩大在农业生产上的投

资。原因是:

第一, 价格体系不合理。国家从1978年开始对主要农产品实行了有计划的大幅度提价, 1984年, 粮、棉、油料混合平均价格比1978年提高了50%。同时, 国家对猪、牛、羊、禽、蛋、水产品等8种农副产品的销价平均提高80%以上, 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相对稳定。农民从价格调整中获益不少。但是1985年以后, 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很快。1984年至1987年化肥和农药的零售混合平均价格分别提高了81%和246%, 远远超过同期粮食和食用油收购混合平均价格的上涨率。1986~1988年粮食定购价只作了微调, 但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却上升了23.2%。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 农产品成本提高, 农户收益下降, 所以农民扩大生产投资的积极性减弱了。1986年农民人均用于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由1985年的18.7元降到16.66元, 下降了10.9%, 按全国8亿农民推算, 共减少了大约16亿元的生产性投资。

价格体系不合理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与农民的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即收入越高, 影响越大。生产规模越大, 投资越多, 受的相对损失越大, 所以高收入户更不愿意扩大投资, 只想维持原有的生产规模。当然, 这并不是说高收入户生产投资绝对金额比中、下层收入户更少, 只是说明他们不愿意在农业生产性消费上再花更多的钱。

第二, 不同产业的比较效益吸收高收入户的资金向非农业转移。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向第二、三产业。高收入的农户除了少数种田能手是务农致富外, 大部分是通过从事其它产业而致富的。如跑运输, 经商, 搞建筑, 当包工头等, 都比务农赚钱多, 赚钱快。因此, 高收入农户对“农需物资”的需求并不迫切, 而对资金的需求比中、低层收入农户强烈。中低层收入农户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 他们对“农需物资”的需求就显得更迫切些。这种因收入不同而对农需物资消费需求程度递减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形成“穷人种田, 富人经商”的现实情况, 或者说“种田者穷, 经商者富”。

其次, 在生活消费需求中, 高收入农户比中、低收入农户对住房的需求显得弱一些。这是因为改革以前农民收入太低, 生活性消费积累太少, 住房几十年来都没有能力进行修缮和翻新。在改革的第一阶段里, 先富起来的农户在吃饭问题解决后, 大都建了新房。房屋作为固定资产, 不必年年重新建造, 他们的住房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暂时不需盖新房。我们从1981年到1989年农民建房的速度上可以看到, 农民建房热1985年已达到高潮。

以后建房热开始降温, 到1989年平均每户年内建房间数已低于1981年的水平。这并不说明农村住房已经解决, 农民不想再建新房了, 只说明先富起来的人大部分已经建了新房, 所以他们对房屋的需求比中低层收入农户要弱; 中、低层收入农户虽有建房要求, 但由于积累不够, 建筑材料涨价, 土地管理更加严格等因素的限制, 建房愿望暂时还不能实现。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 所以回答建房需求的频数低于生产性消费。

表 4 1981~1989 年农村户均建房统计表(间数)

年	1981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间数	0.27	0.30	0.29	0.27	0.25	0.23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1990年)

再次, 高档生活消费品拥有量与农户收入有较强的相关性(见表5), 低收入层与高收入层相比, 有明显的差距。在低收入层, 没有高档消费品的农户占32.3%, 拥有我们开列的9件高档消费品的只占0.5%; 在高收入层, 情况正好相反, 没有9件件的农户只占3.8%, 拥有9件件的占7.5%, 是低收入层的15倍。此外, 表5显示, 各个收入层高档消费品的众数都落在1~3件组, 无论那层收入的农户, 都有50%左右的农户拥有1~3件高档消费品, 但拥有的品种不同, 低收入层的1~3件多是黑白电视机、大衣等, 很少有彩电和收录机。高收入层的1~3件多是高档电器和沙发。这种情形是和收入与住房条件相一致的。

最后, 在发展性消费需求上, 高收入户对“子女教育”需求较为迫切, 在全部需求项目中仅次于

表 5 农户高档消费品拥有量与
1989 年纯收入之相关性(%)

高档消费品	低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高收入户
0 件	32.3	9.6	3.8
1-3 件	50.7	55.6	47.9
4-6 件	16.5	32.8	40.8
7-9 件	0.5	2.0	7.5

Gamma = 0.53

对“科技”的需求而列为第二位。中等收入农户把“子女教育”放在“农需物资”和“科技”之后列第三位。低收入户虽然把“子女教育”看作发展性消费需求中各项之首, 但同整个需求项目比起来他们把“子女教育”置于“住房”、“生产设备和资金”、“农需物资”和“科技”之后, 列第五位。在“子女教育”方面高收入农户和低收入农户相差很大。这是因为: 1. 高收入户的职业要求使他们对子女

教育更为重视。高收入户有的已经转向非农产业,有的正在转向,新的产业对文化程度的要求更高。2. 高收入农户有足够的资金来供养子女读书和接受其它职业训练。3. 高收入户本人的文化素质较高也使其对子女文化教育更为重视。

四、几点参考意见

1. “山”字型表示了当前我国农民需求的态势,可作为安排市场供应的重要参考系。具体地说,市场安排首先要考虑农需物资的供应和科技服务;要切实解决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例不合理问题;要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格,防止“谷贱伤农”;要在资金方面对农业生产投资给予优惠。这一切都是为了稳住并发展农业生产。其次,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必须切实贯彻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制,采取各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改善农村教学条件。

2. 国家必须加强和改善对农民生活消费的指导。指导要从实际出发,分别指导不同收入层农户的不同消费需求,既不能脱离实际地向高标准看齐,也不能用传统保守观念去抑制农民的生活

性消费。比如,对农民住房建设的指导,过去树立一些典型,标准过高,对中下层收入农户和地区就不适合。再如对农民生活耐用消费品的更新(这种更新往往和婚嫁结合在一起)过去在宣传舆论上是持批判态度的。国家对农民生活消费的指导,一靠市场,二靠宣传,两者要一致起来。

3. 高收入农户对生产性消费需求从总体上低于中、低层农户,值得注意。因为如果农民收入达到一定高度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便开始下降,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小农经济的保守思想,“够吃够喝就行”,“知足常乐”,“发大财太冒风险”。我们在浙江省温岭县访问农民时问他们:“想不想发财?”他们说:“想”。又问:“想不想发大财?”,他们说:“发大财?! 没想过,再说也没门路。”主要是“没想过”,不去想或不敢去想。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社会环境的限制,主要是政策和体制的限制,使农民的生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无用武之地。这要靠深化农村改革来解决,要靠把传统的农业生产变为多种经营同时并举的商品经济来解决。

(责任编辑 孙立明)

会议动态

中国计算机学会 1992~1993 年国际学术会议计划

序号	会议名称	日期	地点	联系人、地址
1	30 周年纪念大会及第八届年会	1992 8.20-24	北京	学会办 北京 2704 信箱, 100080 Tel: 2562503 陈树楷
2	中日电源电子会议 (CJPEC'92)	1992 9.7-10 9.13-14	北京 西安	电源专委 严家跃 北京 2704 信箱 100080 Tel: 2565533 转 415,416
3	国际自动推理研讨会 (IWAR'92)	1992 7.13-16	北京	国际联络工委 史忠植 北京 2704 信箱 100080 Tel: 2565533 转 419
4	第 3 届 CAD / Graphics'93 国际会议	1993 8.23-26	北京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杨 薇 100084 唐泽圣 Tel: 2561144 转 2953
5	第 3 届国际青年计算机会议 (ICYCS'93)	1993 7.15-17	北京	高文(哈工大计算机系) 150006 吴建平(清华大学计算机系)